

第三章——支配主义

“有那么多无知的人在统治聪明人，以至于我有时会怀疑愚蠢是否是一门学问。”（归于葡萄牙诗人安东尼奥·阿莱肖的一句话；其中“愚蠢的人”被替换为“无知的人”）

(1) “支配主义”（Dominationism）这个词，是由“支配”（domination）的词根加上后缀“-主义”（-ism）构成的，后者通常表示一种思想体系或执念。支配主义指的是一种病态的支配——因为并非所有控制都是坏的。实际上，我们总是需要一定的结构，这也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对局势的掌控。

(2) 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必须永远存在支配者和服从者。它不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自主。这是所谓“敌基督时代”的思想，也是我们当下所处混乱的一部分——如同现代的“巴别塔”——因为它建立在谎言之上，并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助长了奴役制度。

(3) 这种思维方式会扭曲规则的运用，把公正变成偏袒，制造失衡，而这种失衡本质上就是一种失败。支配主义者会把权利和资源据为己有，就像把蛋糕全部留给自己一样。而真正有智慧的领导者——不是为了剥削他人的人——会以一种让所有人都受益、共同增值的方式进行分配。

(4) “反支配主义”（Contradominationism）正好相反。它是对抗支配主义的理念——正如后缀“contra-”所表示的那样。这也是我们所坚持的立场。本书标题中所说的“巨人的觉醒”，指的是唤醒那些追求善的人所组成的精神整体，而这个整体是庞大的。其中也包括基督徒，因为真正的基督信仰是解放性的，也是反支配主义的。但如今，大多数人对它的理解仍停留在表面，缺乏真正的觉察。最后，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福音”，因为我在重新讲述耶稣的一生，同时指出传统福音中的问题，并尝试加以理性解释。我相信这是我的使命，因为就像塔尔苏斯的保罗一样¹²²，我也曾与耶稣有过接触。

(5) 支配主义助长一种幻觉，让人相信有些人“更高”，而另一些人“更低”。它甚至会让人变得更糟，只为了把他们贴上“低等”的标签。这是一种低劣的思想体系，传播低劣的观念，其目的只是控制人的身体乃至整个社会，从人们身上夺走那些本不该被剥夺的东西——也就是他们最本质的部分。

(6) 支配主义的思维方式就像一个数学公式，会把一切结果都变成负数。因此，无知被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加以推崇，并与愚昧直接相连。只需看看媒体和电影中人物的塑

¹²² 塔尔苏斯的保罗（Paul of Tarsus，约5—67年）——又称使徒保罗，最初曾系统性迫害基督徒，后来却成为基督教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他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经历显现，才认识耶稣的。

造——他们常被赋予愚蠢的特征——然后人们开始模仿这种行为，甚至自称为“傻子”。当然，这个词本可以指那些与众不同的人，但在如今的使用中，它却成了一种侮辱，甚至是在贬低人的理性与智慧。

(7) “傻” (dumb) 这个词，和“白痴” (idiot) 一样，在媒体中被反复使用，已经变得泛化、失去分量。但这两个词本质上都有同一个问题——因为说一个人缺乏人的智慧，其实是在冒犯圣灵，而圣灵正是我们智慧的源头。

(8) 圣灵通过恢复人的理性来驱除邪灵。所以，当你贬低他人的智力，或者抱怨所谓的“偶然”，其实是在冒犯上帝——因为人的理性反映了祂，而且没有任何事情是在祂的许可之外发生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指出错误的行为；但当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时，我们需要明白，其中存在着更高层次的逻辑。

(9) 如果你不相信造物主，也可以这样理解：当我们贬低人的理性或抱怨现实，其实是在让内在最高的指引反过来对抗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先背离了它。发展理性是我们的责任，而否认他人的理性或否认现实，只会阻碍这种成长。我们需要接触各种不同的思想，并接受现实，去面对挑战，而不是停留在指责和抱怨之中。

(10) 这种病态的支配思想——支配主义——试图把奴役描绘成一种高尚的行为。在这种思维下，被支配的人往往被支配主义者包围，就像野生动物被人类围困、关进笼中一样。

(11) 在支配主义中，选择是基于权力而不是基于价值或能力，这往往导致决策缺乏理性与智慧。因此，邪恶反而成为主导趋势——并不是因为它有效，而是因为它被强行推行，是少数孤立意见的结果，而不是群体智慧的体现。如果所选择的道路真的经过检验、对所有人都有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12) 与社会进行真实的对话，会让真理经受检验——因为一旦被人们付诸实践，其中的缺陷或不足就会显现。如果某种东西低效或不合逻辑，它就无法契合语言与思维本身的要求。

(13) 通过真诚的对话，世界的运行会逐渐趋向智慧——因为交流能够提升思维，使人变得更加理性。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要它不被压制。你的思维范围越广，容纳思想的空间就越大。而语言会自然扩展这种空间——仅仅使用语言，本身就能推动理解的拓展。

(14) 马丁尼奥·达·维拉的歌曲《梦中之梦》 (Sonho de um sonho) 展现了人类思维中更深层、更加潜意识的结构——一种“梦中之梦”的状态。

梦中之梦

(Martinho da Vila - Rodolpho - Graúna - 1997)

我梦见
自己在做一个梦中的梦
梦中的梦
被吸引
心灵敞开
没有沉默的嘴唇

青春警醒
有翅的存在
我的梦
我梦见我在做梦
我梦见
我是一个像普通人一样统治的王
一人如千人，千人如一人
如同自由的光芒穿越天空
与宇宙相连
驱散迷雾
哦，可怜的我
哦，可怜的我，我几乎没有做梦
在清澈如镜的世界里，我只看见纯净之物
如圆月照耀树梢
在控诉者与审判者之间，是没有愤怒的微笑
为了约束而存在的怜悯与温柔
没有折磨的牢笼，纯真的快乐
哦，我的上帝
一个我所梦见的虚幻之梦
哦，可怜的我
我梦见自己没有做梦
但我确实做了梦

(15) 这个梦反映了一种在社会中逐渐实践的智慧——正如“红凤凰预言”所预示的那样。马丁尼奥·达·维拉所表达的梦，指向一种曾经处于无意识层面的认知领域，而这些层面之所以少被探索，是因为曾被谎言所掩盖。

(16) 你掌握的词汇越多，思维能力就越强——因为你拥有更多可以用来思考的“材料”。除非这个人只是机械重复他人的话，只是传递他人的语言，却没有真正理解或内化。

(17) 相反，当一个人自认为对方低于自己时，他其实在缩小自己的能力。这种心态会导致自身的退化——因为行为会随这种认知而改变。而支配主义正是在鼓励这种思维方式。

(18) 一个人的成长能力，并不在于压过别人，而在于超越自己。

(19) 支配主义通过强制行为来运作，因为它建立在颠倒的逻辑之上，从而阻碍了社会整体思维的进化。它几乎可以说是“愚蠢的学问”——通过让能力最弱的人掌权来对抗更高层次的智慧。这样一来，即使思维更开阔的人，也只能重复那些思维更狭隘者的话，最终拉低所有人的认知水平。

(20) 在个人层面，我们的自我中也会发生类似于社会层面的过程：意识通过谎言和控制压制无意识。如果不是这样，梦境或许就不会显得如此神秘。这种梦的神秘感，源于内在的冲突。梦中那种神秘氛围，其实是由我们内在的“阴影”构成的——它们试图阻止无意识传递信息¹²³。

¹²³ 梦既可能是灵性体验，也可能是身体进行心理调节与净化的一种表现等。

(21) 例如，当我们解读反复出现的噩梦时，就像打通了一条被堵塞的通道，噩梦也随之停止。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是在不断尝试传达某种信息。反复梦境中的细微变化，往往预示着做梦者生活中的重大转变。而当噩梦终于结束时，也意味着某个内在的“障碍”被解除，这条通道重新被释放。

(22) 支配主义通过有意识地制造恐惧来运作，使我们的的心灵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容易产生“清醒时的噩梦”。正因如此，内在冲突始终得不到解决。

(23) 当理性的成长让无意识逐渐被意识所理解时，支配主义却在做相反的事情——它不断增加无意识的层次。谎言必须不断扩张才能维持自身，这会把真相推向更深的心理层面，使其只剩下模糊的感觉，远离确定性。

(24) 社团主义是支配主义运作方式的一个典型例子¹²⁴。在这种体系中，支配者既是合作者，也是被束缚者：一方面他以为自己在掌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服从“更高层”的人。因此，身处这种结构中的人始终处于被支配的状态——即使他们以为自己在支配别人。

(25) 当然，有些情况下谎言是必要的。比如对孩子说：“如果小偷来了，不要说金子在哪里。”我们都需要一点“保留”，以避免某种“心理上的赤裸”。有时，损害我们的并不是谎言，而是过度的坦白——因为并非一切都需要被说出来。但荣誉准则与“沉默法则”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前者中，谎言是为了保护自己，是正当权利的体现；后者中，沉默则是被压迫强加的。

(26) 公共机构是观察权力运作的典型场所，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是如何被正当或不正当地使用，是个体行为还是系统性行为。在这些地方，一切行为都必须先有法律依据，才能执行。

(27) 财产查封¹²⁵——即法院为清偿债务而扣押财产——就是一个需要保密信息的例子。如果当事人提前得知，可能会转移财产，从而阻碍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保密是对权力的正当运用，是一种合理的规范。如果查封理由正当，那么整个法律程序体现的是司法公正，而不是支配主义。

(28) 合法性本身并不难判断。但在现实中，法院工作人员和实习生常常遭受精神压迫——他们被迫承担过量工作，以弥补一些受保护人员、管理者甚至法官的低效表现。这正是支配主义的体现。

(29) 我曾亲眼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位女性身上——在她遭受这种骚扰期间，甚至在之后，她周围的人却表现得仿佛一切正常。更糟的是，她的同事开始像她的上司一样对待她，重复那种羞辱性的行为，助长这种欺凌，并从中换取好处。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她，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对立面。于是，一种“沉默法则”形成了。

¹²⁴ 社团主义 (Corporatism) ——此处指一种吸纳其成员利益的组织或结构。

¹²⁵ 第13.105/2015号法律第831条（巴西《民事诉讼法》）——“第831条：查封应针对足以覆盖更新后的本金、利息、费用以及律师费的财产。”参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5-2018/2015/lei/113105.htm.

(30) 支配主义者总是以群体形式行动。他们彼此依赖，以维持谎言的存在。“沉默法则”的作用，就是孤立和控制个体。但一旦有人打破这种规则，与他人联合，这种行为就会被视为威胁，因为它不再受控制。比如耶稣，他从未表现出攻击性，他所做的只是打破沉默，但这已经足以让整个体系对他产生敌意。因此，本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谨慎。

(31) 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其早期著作中批判支配体系时，不得不以两位学生的名义发表作品，这很可能是因为出版方面的压力。署名这些作品的学生——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不久后便消失了。我无法断言他们被害，因为没有确凿证据。但关键正是在这里——不会有证据。这个体系早已进化到能够抹去痕迹。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都在确保那些匿名的受害者不会成为被人铭记的殉道者。

(32) 例如，在巴西1964年的军事独裁时期，一切迹象都表明军方试图让民众保持沉默，并掩盖支配体系的变化。而在今天，一个与国际政府相关的庞大腐败与犯罪网络依然存在，这一结构正是在当时逐渐形成的。这也让我们看到那场镇压的真正目的：不仅是抹去书本中的知识，更是抹去人们头脑中的认知。这种做法正是为了建立一种“沉默法则”，类似于中世纪的情况。

(33) 如果认为我写这本书不会面临风险，那就太天真了。我正在揭露一个持续了数十年、至今仍然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体系。但即便如此，这一切其实是脆弱的。一次意识的觉醒，就足以将其瓦解。而我正在尝试做的，正是通过打破沉默来实现这一点。

(34) 在当今的巴西，围绕系统性压迫的沉默已经深到几乎让人感觉它不存在。针对民众的各种侵害明明摆在眼前，但几乎没有人作出反应，因为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自己的权利。而即便了解，也常常觉得无能为力。毕竟，警方几乎只专注于“禁毒战争”，他们并不是在保护公民，而是在针对公民。整个国家机器以及与之相关的结构，似乎都在对抗人民，使人们暴露在各种社会风险之中。

(35) 这些侵害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企业——在面对人时，它们往往冷漠无情——也来自一些外来力量，它们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缺乏关心。

(36) 此外，社会层面的恐惧不断被强化，让人们始终生活在对新一轮暴力压迫的担忧之中，就像军事政权时期那样。这正是支配主义者的运作方式——间接施压。他们通过制造恐惧让人保持沉默，从而阻止真相被说出。而说出真相，正是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途径。

(37) 因此，我们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出真相——为社会形成一种健康的共同认知创造空间。因为善本身是一种理性的逻辑，而恶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要建立这种集体意识，清晰的概念至关重要。

(38) 以“无知”这个词为例，如果人们不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就会在思维上陷入混乱，被低层次观念困住，从而阻碍理性思考。无知，本质上是缺乏正确的概念，这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和不良的结果。

(39) 在巴西，“无知”这个词常被用来表示“愤怒”，这种联系值得注意。实际上，问题在于：无知的人缺乏足够的语言来理解自己或他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状态，这种表达能力的缺失，使他们更容易情绪失控。

(40) 当人们无法正常沟通时，就容易变得具有攻击性，因为思想被困在内心，逐渐积累成压力。他们需要一种宣泄，也就是一种心理上的释放方式¹²⁶。但如果这种释放没有配合清晰的概念来整理这些冲突，那么它就没有真正的效果。只有通过清楚地界定事物，我们才能预防冲突；即使冲突发生，也可以通过准确的定义来解决。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整个社会。

(41) 当我们缺乏正确的概念时，就容易把事情看成命运，或当作针对自己的攻击。整个冲突的产生过程，都与无知直接相关。没有清晰的概念，我们作为“以概念思考”的存在本身就会被削弱。而如果在情绪激动时，尤其是在道德压力之下，我们没有说出真相，那么这种混乱只会加剧。因此，治疗者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来访者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42) 事实上，对某些事情的无知，是人类普遍的状态，这并不是一种侮辱。没有人能够无所不知。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领域、哪种教育背景，都存在各自的无知。不论是流浪者还是住在豪宅中的人，每个人都有可以分享的知识，也都有不了解的部分。

(43) 能够理解这种显而易见且必要的自然状态的人，更能敏感地面对自身的无知，并意识到在没有谨慎的情况下处理未知事物所带来的后果。不承认自己的无知，就像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撞上障碍，从而陷入困境。

(44) 相反，支配主义体系把无知当作一种冒犯，并鼓励人们否认自己的无知、强行把自己的理解加诸他人。这会阻碍沟通，导致更低水平的解决方式。例如，“不打破几个鸡蛋，就做不成煎蛋”这句话，暗示了“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会推动人们侵犯他人的权利、制造破坏，以满足自身需求，仿佛自己处于“不得已”的状态。

(45) 在刑法中，“紧急避险”可以免除责任¹²⁷。但支配主义体系会扭曲这一概念为自身服务。它鼓励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因为混乱为支配者提供了更多滥用权力的空间。它还会让人误以为自己“必须如此”，从而更容易伤害他人，并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很多时候，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将不尊重他人视为常态的环境中。

(46) 这种对权利侵犯的“常态化”，在电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追逐小偷的场景中，人物会撞翻食物摊、撞倒老人、婴儿车、女性等等，而这些情节其实包含着更深层的含义。

¹²⁶ 关于该术语的更多定义，参见 <https://pt.wikipedia.org/wiki/Catarse>。

¹²⁷ 巴西第7.209/84号法律第23条第1款。参见：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1980-1988/17209.htm。

(47) 在这些影视作品中，观念被操控，以颠倒逻辑的方式呈现：深层的道德价值被削弱，而浅层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被强化。自私、感官化、肉体化的欲望被置于理性意志之上，从而鼓励不良行为与不尊重他人。在这种个人主义中，视野只剩下被追逐的“自我”。

(48) 当然，有时人们确实需要采取更直接甚至较为原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或保护弱者。毕竟，心怀恶意的人，只有在意识到会遭到反抗时才会收敛。这种对抗本身，也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一种力量，因此它是必要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尽量避免伤害他人，或者至少把伤害降到最低——就像我们希望在角色互换时别人对我们所做的那样。

(49) 这些影视作品通常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大男子主义之上，这些意识形态会让人对浪费与压迫变得麻木。在这样的背景下，支配主义观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形成，把反对的声音困在其中，仿佛存在一种不可动摇、无需质疑的“既定理解”。

(50) 这种不健康的支配不断演化，以维持自身的隐蔽性。它以控制为核心，通过压迫与对立来制造表面的统一，把权力与注意力集中在支配者身上，并借助负面情绪来维持这种结构。人们难以认识真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以为这种病态的支配是必要的。

(51) 支配主义者乐于操控他人，把人当作自己的“所有物”，仿佛对方没有自由意志。根据他们所抱持的幻觉，当有人不服从时，他们往往会采取更加不正当的手段，以维持自己“掌控一切”的感觉。

(52) 例如，支配主义者可能会给孩子送礼物，只是为了借此控制其中一位家长。随后，他们又会说服家长因为孩子没有好好保管礼物而惩罚孩子，然后再去安慰孩子。通过制造分裂，再分别向双方提供“支持”，他们把整个家庭都绑在自己身上，让成员彼此牵制，从而实现控制。这正是整个体系的运作方式。

(53) 支配主义者还会试图让人相信支配是有益的，比如电影《黑客帝国》。这类电影属于未来末世题材，往往用“资源稀缺”和“生存需要”为支配辩护。在我看来，其隐含的信息是：我们确实被某些观念所支配，但这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54) 《阿凡达》¹²⁸ 虽然走的是类似的路径，却把人引向解放。它同样展示了观念层面的支配，但传达的信息却是：人类缺乏道德——那种想要支配他人、占有他人之物的冲动——才是造成这种扭曲现实的根源。同时，它也让人反思体制内那种机械化的生活，并引导人回归灵性。

(55) 食物作为一种支配方式，在《黑客帝国》和《阿凡达》中都有体现，但方式完全不同。在《黑客帝国》中，人物渴望系统提供的食物；而在《阿凡达》中，主人公拒绝这种食物，只为生存而进食。因此，在《黑客帝国》中，人被味觉所控制；而在《阿凡达》中，则没有这种控制。

¹²⁸ 200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并制作，出品公司为 Lightstorm 和 Dune Entertainment，发行方为二十世纪福克斯。

(56) 通过食物进行支配，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帝国主义通过引入快餐文化，以观念的形式渗透，同时推广令人上瘾的饼干和含糖饮料来实现这一点。如今，人们有时会批评这些食品对健康的危害，但社会整体并没有真正作出反应，因为大众已经对这种味觉形成了依赖。

(57) 成瘾——即使只是味觉上的依赖——也是让人相信自己并没有真正自由意志的一种方式。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奴役。直到今天，人类一直生活在某种集体性的奴役之中。有些人认为过去只是存在“选择性的奴役”，但这种看法往往让大多数人对奴役本身视而不见。

(58) 事实上，任何制造奴役的体系，本身也是被奴役的整体，即使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有配合这种体系运作的人，在精神上都是奴隶。支配者为了充当“监工”，不断服从支配主义的规则，从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他把自己锁在对他人的控制之中。从心理上看，监工往往比奴隶更受束缚，因为他的人生围绕着“控制他人”展开，而凡是以束缚他人为目的而活的人，最终也会被束缚。¹²⁹

(59) 只要有支配主义存在，就必然会有冲突，甚至可能演变为肢体冲突。总会有人不惜一切代价去装出自己拥有并不存在的资格。因为事实是，没有人比别人更高一等。

(60) 支配主义是一种系统性的运作，它由个人的情绪驱动，比如嫉妒或虚荣。竞争会让人的心态失衡。国家之间互相破坏，就像彼此嫉妒的兄弟一样。然而，嫉妒本质上是个人层面的行为，它会带来严重后果，比如拖延人类整体的进步——因为最优秀的往往会因嫉妒而被打压。

(61) 正因为人们习惯于打压善、让不正当行为占据上风，我们的灵性发展依然非常有限，而耶稣也曾承受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后果。

(62) 也正因如此，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多是由恐惧主导，而不是由爱主导。人们甚至把恐惧当作一种合理的动机。当我们说自己出于爱而行动时，往往会被嘲笑；而当我们说出于恐惧时，却更容易被接受。然而，正如本书一开始所论述的，真正的上帝是爱的上帝，而不是恐惧的源头。

(63) 当我们相信错误的观念时，就会在生活中制造破坏，并懦弱地把责任归咎于上帝。正是这种对上帝的错误理解，使人难以明白：用痛苦去回报恶并不是必要的。真正的上帝带来的是公正，如果我们以爱来偿还“债务”，通过奉献或善行去回应，甚至可以减轻负面的后果。我们也可以通过善待自己，来中和所遭受的伤害。

(64) 集体思维之所以影响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像处在一股巨大的潮流之中，不断发出和接收“波动”。我认为圣灵正是这股宏大的潮流，因为祂是人类理性所源自的神性力量。但同时也存在一种负面的“社会自我”——由病态的支配所形成的思维流——它会把我们拉离更高层次的智慧。例如，亵渎性的言语会让人远离灵性，因此我们应当避免。

¹²⁹ 圣经，启示录13:10——“如果人应该被俘掳，就必被俘掳；如果人应该被刀杀，就必被刀杀。在这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

(65) 圣灵不仅仅是一个“灵”，祂是上帝的终极心灵显现，将我们的意识连接在一起——当我们与上帝合一时，彼此也会合一。奇科·泽维尔的导师埃马努埃尔在其著作中描述过五旬节¹³⁰，但他并未完全理解圣灵的本质，就像大多数宗教人士一样。真正的常识往往会自然趋向圣灵，因为祂更高。然而，由于体系不断提供虚假的观念以维持支配，一个“虚假的常识”也随之形成，把人的思维引向负面的集体自我。

(66) 即使是虚假的，“常识”仍然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潮流，就像一股庞大的思维波动，影响着整个人群。一个人很难单独与之对抗。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参照。常识就像一本“词典”，用来解释和定义我们共同使用的语言体系；没有它，我们会失去思想的内容与意义，也会失去稳定性。

(67) 我们的思维本质是以概念为基础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意义体系。而支配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它通过让人变得迟钝，使社会整体产生一种“稳定”的错觉。但这种迟钝之所以看起来像平衡，只是因为在这两种状态下，思想似乎都停止了流动。

(68) 实际上，概念始终在变化之中。但我们之所以感觉它们是静止的，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已经稳定下来的群体内部，就像坐在一列与旁边列车同速同向行驶的列车上——一切看起来都是静止的。语言进入“常识”之后也是如此：它显得清晰而确定，好像只有一个意义，没有任何疑问，因此看起来像是固定不变的。

(69) 当一个人因为打破沉默或反对体系而被排除在这种共同认知之外时，他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像被从“理性”本身中切断一样。他失去了参照点，语言体系变得模糊，但他的思维仍然需要清晰。当我们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得不到回应或确认时，就会开始感受到这种崩塌。

(70) 对我们来说，理解本身就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因此一旦失去，就会带来痛苦。有时，由于缺乏反馈而产生的不稳定感，会让人产生“自己是错的”的感觉；如果这种感觉过于强烈，就可能引发对“正确性”的强迫性追寻。这会导致大量意义相近的想法不断涌现，人们试图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强行让语言变得清晰。

(71) 这种自由联想的泛滥，可能发展为所谓的“加速性思维综合征”¹³¹，即思维过快、问题不断却得不到答案，以至于连最初的问题都被遗忘。疑问不断增加，记忆无法

¹³⁰ 圣经，使徒行传2:1-3——“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而降，充满了他们坐在里面的整间屋子。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各人身上。

¹³¹ 加速性思维综合征 (Accelerated Thought Syndrome, ATS) ——由巴西精神科医生、教授、也是“多焦点智能理论”提出者奥古斯托·库里所提出的一种心理状态。其特点是在清醒状态下思维持续高速运转，导致焦虑增加、注意力下降，并对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跟上思维的速度。最终，这种过程虽然看似“聪明”，却走向死胡同。最好的做法，是避免陷入这种循环¹³²。

(72) 系统在社会交流中使用的那些“暗示”——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就是一种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把潜在观念植入语言体系的方式。它们刻意避开那些容易被批评的词语，使表达变得模糊不清，从而让思想更难被理解和分析。

(73) 这种模糊性会让人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与矛盾之中——因为他们找不到准确的表达方式。理论上，讨论应该引导社会思维走向更好的共识，并带来稳定；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争论往往重建了一种类似“加速性思维综合征”的混乱状态。肤浅而无结果的观点，使社会思维持续不稳定，仿佛陷入混乱。

(74) 当真正的“常识”形成时，原本的争论会转化为统一的认知——前提是人们是在追求真理，而不是强加观点。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真理是绝对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甚至无法在语言上达成一致。一个人说“胰腺”，另一个却理解为“肝脏”。理解可以是相对的，但真理不是。

(75) 支配主义的思想恰恰相反——它通过制造信息冲突来破坏思想的统一，把人们推入对立的争论之中，使他们被困在各自的观念圈子里。这正是一种“巴别塔效应”。看看周围，有多少毫无意义的争论正在发生。而更奇怪的是，本应属于建设性探索的一部分——对立与分歧——却变成了常态，而不是例外。难道我们真的无法达成任何共识吗？难道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共同认可的吗？

(76) 为了让这种混乱在社会思维中进一步扩大，体系还鼓励人们变得“反应性”，通过公众人物或角色去示范这种行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应性的人更容易被控制。主动行动的人由自己的意志引导，而只会反应的人则是对外界刺激的回应。因此，以“反应”为基础的情绪——例如愤怒——往往会制造社会冲突，应当加以避免。

(77) 当反应占据主导时，人们就不再倾听。如今，人们常常在还没真正理解对方说什么之前，就迅速用一句“不是”来回应，直接中断对话。我会建议人们正确使用“不是”：可以迅速，但要经过思考，而不是出于冲动。

(78) 由于这种体系的运作方式，那种不加思考的本能反应正变得越来越强。人们急于节省时间，结果变得更加肤浅，也越来越远离真实的交流。沟通越是即时，人们就越不愿意放慢节奏、认真讨论。因此，很难得出真正的结论。这个过程不仅削弱了理性能力，还会让人逐渐变得“心理上的聋与哑”，从而加剧彼此的分裂。

¹³² 在第十二章《抑郁与疾病的制造》中，我提出了一些控制焦虑的心理练习，其起点是放缓思维的速度。

(79) 此外，在支配主义的思想中，对立、冲突和分歧是常态，因为权力斗争从未停止。再加上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人们会表现得好像自己高于他人，仿佛拥有某种并不存在的“资格”去否定他人。而这一切会不断循环，因为人们接受了一种虚假的“常识”，这种常识由一群情绪化反应的人共同维系。

(80) 这种虚假的常识，是支配主义者通过操控对立性争论而建立的，他们引导结果始终有利于少数人，而不是整体。在这种模式下，人们逐渐接受对自身权利的侵犯，使人与人之间的安全感被削弱。甚至连语言本身也被塑造，以掩盖体系的运作，从而让这种权力滥用看起来“合理”。

(81) 他们对人的控制，直接依赖于削弱人的意志——而意志本身是一种心理活动。因此，这个体系甚至试图界定你的思想。如果“我思故我在”¹³³是成立的，那么同样可以说：我们就是我们所思考的。虽然思考本应由我们自己完成，但大多数人却无法掌控自己的思想。没有自主的思想，也就不可能有自主的行动。

(82) 相反，真正的知识——也就是理解——赋予我们行动的能力。而这不仅仅是信息的积累，逻辑与推理往往更能引导人走向智慧。毕竟，世界本身就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必须谨慎面对一切，因为哪怕一点点无知，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83) 错误的概念被传播，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知识。这不仅可以引发社会冲突，还会让人做出错误的决定。仿佛在一种“选择机制”中，总是选中了最差的选项，而不是最好的——仅仅因为支配主义者从失败与损失中获利。

(84) 因此，支配主义者倾向于让思维受限的人掌权——这些人通过谎言制造分裂，只接受单一声音，从不质疑命令。他们试图把所有人拉入一种浅层、物质化的平庸状态，而真正的出路，恰恰在于超越这种状态。他们在人的理性周围建立起无形的界限，阻挡真实而有益的概念，用虚假的观念取而代之，从而让人不断退化。

(85) 如果支配主义者真的能够让这种退化成为永久状态，人类就会像牲畜一样，被困住并受制于“捕食者”。但他们的胜利从来不稳固。他们必须不断努力去压制人，因为进化的力量比他们更强，无法被阻止。我们每个人都在教导他人，同时也能从每个人身上学习。

(86) 支配主义者通过缩减和扭曲概念来控制个人与群体。例如在巴西，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被重新塑造，使他们更容易被控制，因为他们失去了积极的身份认同。我们的文化在我们自己眼中失去了价值，而这正是通过媒体实现的一种操控。

¹³³ “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是17世纪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尔提出的名言。他在其时代对哲学与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87) 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军事政变之前，巴西的身份认同还与一种真实而自然的享乐精神相关。《巴西水彩》¹³⁴ 这样的歌曲赞美了这个国家的自然之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色彩以及多样的动植物。同时，卡门·米兰达的形象与音乐¹³⁵，也向世界传播了一种热带的巴西形象——一个充满丰富多样水果的土地。

(88) 在电影中，迪士尼角色泽·卡里奥卡塑造了¹³⁶ 一个积极的巴西形象。在《致候吾友》¹³⁷ 中——影片中包含《巴西水彩》并向卡门·米兰达致敬——泽被描绘成一个没有钱却生活在如同天堂般环境中的巴西人。但这种形象其实是美国心理渗透策略的一部分，即所谓的“睦邻政策”。在漫画中，这种叙述更进一步，强化了“狡黠者”的刻板印象，把巴西的享乐主义与懒惰和不诚实混为一谈。

(89) 随后，军事政权上台，巴西文化遭到强力压制——被国家审查与打击。作为回应，民众走上街头，掀起大规模抗议。即使面对军队的暴力，抗议者依然保持道德立场，并彼此团结。然而与此同时¹³⁸，媒体和影视产业却在破坏这种形象——不断攻击巴西人的诚实与正直，直到人们开始相信自己本质上就是腐败的。

(90) 之后，巴西社会经历了一种“去教育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削弱了人的本质。这使得支配主义者更容易以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共识”为依据，对民众加以轻视，认为巴西人总是出于不良动机行事。

(91) 如今，我们正经历一种彻底的价值颠倒——因为谎言被应用于一切之中。这个体系违背了它本应维护的一切，遵循一种“通过破坏获利”的逻辑。律师让客户陷入诉讼或牢狱之中；学校让学习变得更加困难；医疗反而加重疾病；警察掩盖犯罪；宗教不再解放人，而是进行谴责；而本应建设国家的巴西政府，反而在推动其衰败。

¹³⁴ 《巴西水彩》（*Aquarela do Brasil*）——是巴西最著名的歌曲之一，由米纳斯吉拉斯州作曲家阿里·巴罗索于1939年创作。这首桑巴最初由歌手弗朗西斯科·阿尔维斯录制，此后被众多艺术家翻唱，包括卡门·米兰达、弗兰克·辛纳特拉、若昂·吉尔伯托、汤姆·若宾、卡埃塔诺·维罗索、蒂姆·马亚、加尔·科斯塔、埃拉斯莫·卡洛斯以及埃利斯·雷吉娜等，直至今日仍不断被演绎。《巴西水彩》成为巴西音乐的重要象征，几乎像一张“音乐名片”。

¹³⁵ 玛丽亚·多·卡尔莫·米兰达·达·库尼亚——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卡门·米兰达——是一位葡萄牙出生的歌手和演员，十个月大时移居巴西。她的艺术生涯横跨巴西与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持续到50年代，活跃于广播、戏剧、电影和电视领域，成为巴西在国际上的文化象征。来源：维基百科。参见：
[\[https://pt.wikipedia.org/wiki/Carmen_Miranda\]](https://pt.wikipedia.org/wiki/Carmen_Miranda)[\[https://pt.wikipedia.org/wiki/Carmen_Miranda\]](https://pt.wikipedia.org/wiki/Carmen_Miranda)。

¹³⁶ 图像III，第101页——泽·卡里奥卡（*Zé Carioca*）是华特迪士尼公司创造的拟人化鹦鹉角色，首次出现在1942年的动画电影《致候吾友》中，被塑造成一位时尚的巴西鹦鹉，带领唐老鸭游览里约热内卢。

¹³⁷ 《致候吾友》（*Alô, Amigos / Saludos Amigos*）——是迪士尼于1942年制作的动画电影，出于外交目的对巴西进行了描绘和赞美，因此被视为“睦邻政策”的一部分。然而，这部作品也成为记录巴西文化的优秀影像资料。即使今天美国可能试图削弱我们的文化认同，这部电影却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永久保留下来。

¹³⁸ 图像XV，第434页。

(92) 巴西政府被帝国主义力量所利用，服务于其商业利益以及外国政府的利益，而牺牲本国人民。这种控制首先通过暴力施加，然后通过意识形态加以巩固——一旦抵抗被打破，支配就会显得“理所当然”。

(93) 巴西的军事独裁时期，标志着大众媒体开始被用来对付人民、剥夺其尊严。在现实中暴力被直接实施的同时，各种所谓的“教育宣传”则传播着潜在的信息，试图瓦解巴西人原本充满活力与享乐精神的文化。例如角色苏吉斯蒙多¹³⁹，在表面上宣传卫生与良好习惯（这些本身是合理的），却把我们的河流描绘成污染严重，即使背景明显是乡村地区。而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巴西仍然拥有大量被河岸森林保护的河流，这些河流保持清洁，适合人们游泳。

(94) 同样地，水果也被不断与垃圾联系在一起。无数影视作品中，人们踩到香蕉皮滑倒，把水果变成一种笑料。讽刺的是，香蕉正是卡门·米兰达通过歌曲《Yes, Nós Temos Bananas》¹⁴⁰所推广的代表性水果之一。甚至在漫画中，水果也常被画在垃圾堆中，仿佛它们本身就是垃圾。

(95) 除了苏吉斯蒙多之外，当时还有以一个名为加斯托尼尔多角色为主的宣传活动，但我在网络上几乎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资料。这种“消失”显得可疑，仿佛有人刻意将其抹去或隐藏。因此，我特意记录了我唯一找到的数字来源中对他的间接提及¹⁴¹。以下是罗伯托·恩格尔创作的第1、2、3号广告歌的内容概要¹⁴²。

加斯托尼尔多总是随意浪费水，
用水管洗车，毫不在意。
用桶吧，动动脑子吧，加斯托尼尔多，
处理过的水不该被浪费。
加斯托尼尔多总是随意浪费水，
刷牙时水龙头一直开着。
关掉水龙头，清醒一点吧，加斯托尼尔多，
处理过的水不该被浪费。
加斯托尼尔多总是随意浪费水，
洗澡超过半小时也不在意。
时间少一点，节约多一点，加斯托尼尔多，
处理过的水不该被浪费。

¹³⁹ 巴西角色 Sugismundo——由 Ruy Perotti Barbosa 于1972年创作，在整个70年代出现在巴西联邦政府的广告歌曲中。该角色因不良清洁和卫生习惯而陷入困境，从而起到宣传个人卫生重要性的作用

¹⁴⁰ 布拉吉尼亚，阿尔贝托·里贝罗，1937年。

¹⁴¹ 参见：soundcloud.com/search?q=gastonildo

¹⁴² 罗伯托·恩格尔——是一位从事广告创意的专业人士，拥有超过20年的市场营销、机构传播及推广活动经验，涵盖BTL（线下传播）与ATL（大众媒体）平台。他主要从事广告创意与销售激励活动的策划，拥有工业、服务业及零售领域的经验。来源：SoundCloud。参见：<https://soundcloud.com/robertoengel>。

加斯托尼尔多总是随意浪费水，
洗碗时水龙头一直开着。
关掉水龙头，清醒一点吧，加斯托尼尔多，
处理过的水不该被浪费。
加斯托尼尔多总是随意浪费水，
每天晚上冲洗人行道。
别再这样了，拿起扫帚吧，加斯托尼尔多，
处理过的水不该被浪费。
加斯托尼尔多总是随意浪费水，
每天都把游泳池装满。
停止吧，改掉吧，加斯托尼尔多，
处理过的水不该被浪费。
不要成为加斯托尼尔多，
如果浪费，水终会耗尽。
节约用水，
这是若因维利供水公司与若因维利市政府的宣传。

(96) 加斯托尼尔多被“抹去”，很可能是因为他教人如何避免浪费，从而避免耗尽自身资源。例如，浪费水就是对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的一种侵犯。然而，如今许多影视、网络和媒体中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都像加斯托尼尔多一样，但他们的有害行为却没有被指出。为什么？因为浪费本身服务于资本主义利益。

(97) 从理论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侵犯他人的权利——因为我们都拥有某种形式的“权力”。没有人是完全中立的。至少，我们都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这必然会影响到他人的自由意志，反之亦然。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种力量。

(98) 自由意志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力量——其他一切力量都源于它。它的运用必须受到权利与责任的约束。因此，我们需要法律来界定这些边界，并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意志。

(99) 从原则上说，法律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个人的智慧。它是经过数千年社会经验不断积累和完善而形成的思想成果。掌权者的职责，就是确保法律得到执行。一旦他们失职，社会就会进入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每个人只能自我保护，这也就导致了社会失衡。

(100) 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力”，实际上是对他人自由意志进行干预的许可。但这种许可是社会赋予的，是意志之间的一种约定，它始终低于自由意志本身。

(101) 行动的权力可以通过契约、法律或自然状态获得正当性。法律上的正当性在巴西1988年宪法第5条第II项中有所规定：“除法律规定外，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做或不做某事。”

(102) 法律是最重要的社会契约——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巴西的法律体系本身拥有良好的机制，可以废除不公正的法律、维护正义，并以人权为核心原则。如果不是社会长期容忍政府自身所犯下的违法行为，这一体系本可以运作良好——而政府往往正是最不受惩罚的违法者。

(103)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巴西政府实际上默许了剥夺生命的行为，而警方对此存在滥用。但从法律上讲，没有人拥有这样的权利；从道德上讲，在任何地方也不应存

在这种权利，因为没有人会同意被杀害——只会同意杀害他人。这违背了法律的本质：法律是所有人都应遵守的规则。

(104) 那些凌驾于更高法律之上的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民的“隐形政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把法律体系当作私有工具，系统性地侵犯权利。但终有一天，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公正而完善的法律，因为长期生活在失衡之中是难以承受的。

(105) 这种失衡使社会关系更依赖“强者法则”，而不是真正的权利，从而导致混乱。如果把国家看作一个自然人，那么它可能需要类似监护的管理，就像一个无法自我管理的失衡个体一样。

(106) 事实上，我认为巴西面临的一个风险在于：由于社会整体如同由个体投射而成的“巨人”，这种控制也可能扩展到法人甚至国家层面。企业会进入那些秩序混乱的国家，以“个别解决方案”的形式介入。而这些国家在治理上的缺失，也被帝国主义利用，从而侵蚀其主权。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简单方式，是重新系统性地执行法律，并清除那些允许专制存在的法律机制。

(107) 在巴西，推动社会混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一场由足球运动员热尔松参与的宣传广告。他是1970年世界杯冠军巴西国家队的一员。他出演的香烟广告最早于1976年为Vila Rica品牌播出，随后在1978年为万宝路拍摄。在这些广告中，他反复说一句口号：“关键是始终占便宜。”这句话后来被称为“热尔松定律”¹⁴³。

(108) 然而，总是追求占便宜并不正确。不同的时机有不同的优势，而一味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最终会变成一种有害的行为。这一宣传暗示了文明的流失，以及腐败和不尊重的蔓延——就像足球比赛中，规则本身就是“进入对方的地盘”。

(109) 这种负面观念的植入，背后的主导者是美国和英国¹⁴⁴，它们控制着香烟产业，并借此传播不良影响。这场宣传不仅标志着一种行为转变，也开启了“去教育化”的过程，带来了深远的后果。因为在人类进步中，我们真正的优势，正是我们所获得的文明与教育，而不是缺乏它。没有文明，一切都会变得不稳定。

(110) 教育的核心，在于教导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规则，例如：“一个人的权利止于他人的权利开始之处”、“每一项权利都对应着一项义务”、“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原则。

(111) 在恶意之中，人们往往会保留自己的力量，只为自身利益服务。这种心态阻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而导致分裂。当一个人认为他人的损失就是自己的收益时，对“

¹⁴³ “热尔松定律”——是巴西的一种表达，用来描述一种行为方式，即不顾道德，总是想从一切事物和他人中获取利益。

¹⁴⁴ 万宝路香烟由美国公司菲利普·莫里斯生产，而Vila Rica香烟属于R.J.雷诺兹烟草公司。该公司虽为美国企业，但隶属于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英美烟草公司。

优势”的追求会变得更加严重。敌对本身就是对人类不利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类彼此依赖。

(112) 如果巴西的善意曾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击，那是因为这些国家希望控制我们——而在善意中，一切本可以良好运转、自我调节。怀有善意的人，会用自己的力量去创造共同的利益，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这才是真正“强大”的表现。善意才是进步的动力，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如果这种价值被推广，我们的社会本不会经历贫困，即使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层。

(113) 意志与自我决定和有意识的选择相关。而欲望则更接近一种“化学性的意志”——不一定是理性的，更像冲动或一时的想法。而这种欲望往往会把人引向恶意与自私。因此，资本主义有意把“意志”和“欲望”混为一谈，因为欲望更容易被利用，通常也不包含理性的目标。

(114) 在支配主义之下，权力的行使从未真正获得正当性——即使它被刻意掩饰以显得合理。因此，我认为法律是一种根本性的指引：它是一个稳定的参照点，不断被完善，同时也是责任的来源。判例同样重要，但它也必须建立在更高的法律和基本正义原则之上，并且在必要时可以被修正。

(115) 巴西宪法是一部以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因为它以人权为基础，提供对抗国家权力的保护，例如健康权和尊严权。当人们违法而不受惩罚时，这并不是法律本身的选择，而是政府通过“默许”所作出的选择。

(116) 对权利的无知会使人民陷入混乱，从而实践支配主义的一条规则：“如果无法说服他们，就让他们困惑。”这正是“巴别塔”的一个基础。

(117) 心理上的混乱，同样是1954年危地马拉、1964年巴西、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以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叛乱活动的基础之一。这些行动的真实目的从未被清楚说明¹⁴⁵。然而，无论体系如何试图淡化美国在这些政变中的参与，其计划早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写入美国政府文件之中。这已经足以证明这些行动是由该国推动的。美国方面则以“谨慎”为理由进行干预，但实际上体现的是其扩张性的意图。

(118) 如今，如果我们想在互联网上找到真相，就必须用信息来源地的原始语言进行搜索。例如，前一段提到的关于美国干预的信息，我就是用英文找到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保存纸质书籍——因为它们是稳定的记录，不会被篡改或消失。而数字信息则不同，它随时可能被删除或修改，就像网络上的其他内容一样。但那些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记录下来的资料——揭露美国通过恐怖手段进行帝国扩张——将会被保留下来。

¹⁴⁵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tin_America%E2%80%93United_States_relations

(119) 早在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时期，蒙泰罗·洛巴托就已经揭露了帝国主义这种掠夺性和犯罪性的行为。他相关的作品至今仍然难以被大众接触，因为宣传非常有限¹⁴⁶。尽管如此，这些记录分散存在，而正是这种分散性，最终会让真相浮现。

(120) 在独裁时期，掩盖事实的一种方式就是拒绝确认死者身份。他们被称为“失踪者”，因为尸体从未被找到。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些人之所以被消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能够揭露帝国主义行为的真相。

(121) 帝国主义的策略主要依赖于让人们处于无知之中——对事实的不知情，使得奴役拉丁美洲国家、瓦解其抵抗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在巴西，大学成为独裁时期抗议的主要场所，因为那里的人更直接地看到政府的镇压。

(122) 当时，所谓的“颠覆分子”是主要打击对象，整个社会都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但“颠覆”本身的含义，其实是推翻压在上层的东西，让被压制的一方得到提升。因此，“颠覆者”不过是那些希望结束压迫、改善巴西民众处境的人。

(123) 后来，巴西政府实行了所谓的“特赦”¹⁴⁷。支配主义者声称这是为了“宽恕颠覆者”，但实际上，这一措施却让军事政权中的施害者受益，并使受害者的真相被永久掩盖。因为一旦我们知道他们杀害了谁，就会知道他们为何杀人。而这些人很可能正是因为掌握了真相才被杀害的，因此隐藏身份就成为最有效的掩盖方式。

(124) 如今，那些曾经用来攻击争取巴西解放者（所谓“颠覆分子”）的观念，再次被植入社会之中。这正是支配主义的手法：让受害者反过来否定自身的防御。在20世纪70年代，教师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解释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现在，由于大众缺乏了解，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被“共产主义者”所替代。

(125) 对于那些天真地认为军方应该“回来”的人，我想问：他们从哪里回来？特赦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从未真正离开权力中心。今天的体制，只是过去那一体制的延续，国家军队也是如此。

(126) 自独裁时期以来逐渐传播的色情内容，也被用作对大众进行私密层面控制的一种工具。这在支配主义中几乎是常见手段。历史上，人们曾因扭曲的性观念而做出各种极端行为，而色情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127) 社会对人际关系的压力会造成心理上的混乱，因为无论是性行为还是禁欲，都不应被强迫。任何被强制规定的性行为模式，都会忽视“爱”这一关系中应有的核心动力。

¹⁴⁶ 2019年，一项出版计划启动，旨在重新发行蒙泰罗·洛巴托的两本著作，这些作品至今在巴西仍难以获得。这两本书分别是《石油与铁的丑闻》和《子爵的井：儿童地质学》，创作于20世纪30至40年代，是其作品中较为少见、流通受限的例外。来源：Catarse。参见：catarse.me/lobato。

¹⁴⁷ 第6.683/79号法律。

(128) 不过，色情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破了过去因性压制所带来的心理束缚——那种压制只会导致虚伪和缺乏爱的关系。至少在如今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再通过虚假来掩饰自己。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去追求真正的爱。

(129) 顺便说，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想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人把她当作性压抑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她一定还有其他孩子。但如果玛利亚还有别的孩子，如果耶稣有兄弟或侄子，他们很可能都会被当作犹太王位的继承人而遭到追杀。此外，如果在被钉十字架时，耶稣把母亲托付给朋友约翰，那么可以合理推断¹⁴⁸，他并没有兄弟来共同承担这一责任。玛利亚如果有其他孩子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性——她需要完全自由地把自己奉献给耶稣。

(130) 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性方面的迫害在多大程度上其实是政治性的？看看社会如何对待单亲母亲——玛利亚本人也经历过这种处境。她最初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怀孕，以免被用石头打死。对女性的迫害往往从单亲母亲开始，她们经常被贴上“淫乱”的标签，成为社会中最容易被攻击的群体之一。

(131) 这种迫害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女性通过血脉获得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婊子养的”会成为最常见的辱骂之一。在我们的社会中，孩子往往成为巩固母亲被奴役地位的“筹码”，而他们自身也因此成为奴隶，因为他们是母亲的延续。直到今天，单亲母亲仍然被污名化或被迫处于某种依附状态。但理想的状态应当是由整个社会共同抚养所有的孩子——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人类的孩子。

(132) 如果玛利亚的故事能通过她自己的福音广泛传播，那么女性被奴役的现实就不会再被掩盖，因为她的努力之一正是摆脱这种处境。独身本身也是摆脱女性奴役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种奴役首先体现在性层面。

(133) 同样地，耶稣和约瑟在这一点上也与玛利亚一样保持纯洁。而人们之所以回避谈论他们的这种状态，是因为这会削弱以性为基础的迫害，而这种迫害正是奴役机制的一部分。

(134) 在天主教会中，以性为基础的迫害一直存在。其成员，尤其是女性，往往直接根据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孩子来被界定。教会把“爱的孩子”和“罪的孩子”区分开来，并错误地将前者与合法婚姻中的孩子联系起来，将后者与非正式关系中的孩子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圣经中的这种区分与性无关，而是与关系中的友爱有关。

(135) 所谓“罪的孩子”，是夏娃的孩子——属于支配体系、属于敌对之母的孩子；而“爱的孩子”，则是玛利亚的孩子——属于新约的孩子，是建立在友爱而非控制之上的约。耶稣称他们为“人的孩子”，强调他来是为了捍卫人本身，使人重新获得人性与人的价值。

(136) 在耶稣所处的时代，犹太法律本身充满矛盾：它允许排斥甚至杀戮。女性和麻风病人是这种压迫的主要受害者。耶稣并没有因为女性的性问题而迫害她们，也没有

¹⁴⁸ 圣经，约翰福音19:26-27。

回避与麻风病人接触。例如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的门徒之一——似乎曾有过混乱的性经历。耶稣让像她这样的人重新融入社会，这使他被视为在挑战既有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秩序，也就是挑战支配本身。这并非他的主要目的，但却是他行为带来的结果。

(137) 直到今天，仍有人以耶稣选择男性作为门徒为理由，来维持反女性的观念，尽管他实际上与整个家庭群体互动，而不仅仅是男性。事实上，他当时只能选择男性，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男性能够公开发言、施行洗礼或医治病人，而不会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应。

(138) 值得注意的是：在支配主义中，最先被攻击的往往是女性的权利。女性的声音，即使是在拒绝性行为时，也常常被压制。而当这种声音被听见时，它就像一个温度计，表明支配正在减弱。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猎巫行动”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女性遭受迫害的重要证据，也表明反女性运动很可能是其核心动力之一。

(139) 支配主义通过制造性混乱来去人性化人类，并瓦解我们对“爱”的理解。而反女性主义常常成为触发这一过程的工具。男性被诱导将挫败感发泄在女性身上，甚至进行性方面的侵犯，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这也让人感觉，每当社会有所进步时，反女性的运动就会再次被激活。

(140) 社会用来压制性的一种主要手段，是传播诽谤、造谣和中伤。在巴西，这些属于侵犯个人名誉的犯罪，但它们已经被如此普遍地使用，以至于看起来像是过时的概念。然而，它们依然在破坏社会关系——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组织之间。

(141) 侮辱往往会演变成诽谤和中伤。而一旦形成中伤，即使后来被澄清，虚假信息仍可能停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因此，当有人公开更正或道歉时，理应通过传播原始谣言的同样渠道来进行——如果受害者有此要求¹⁴⁹。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也正是它成为系统常用手段的原因之一，就像假新闻一样。

(142)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某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社会仍然把他当作强奸犯来看待。事实上，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强奸行为要么容忍，要么加以辩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奸文化”的社会，在这种环境中，人们默认没有人是无辜的。

(143) 尽管中伤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当相反方向的新谣言出现时，它也可能迅速被取代——例如，一个人既可能被说成“挥霍无度”，也可能被说成“吝啬”。但为了反击中伤而公开自己的性生活，这并不可取，因为这可能侵犯他人的权利。例如，简单的亲吻可以在日常场合中自然发生，但带有明显情色意味的接吻，则应当保持私密。

¹⁴⁹ 第2848/40号法令（巴西刑法典）第143条唯一款。参见：
lei/del2848compilado.htm.

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

(144) 兄弟般的爱之所以会受到打击，是因为它不会排斥其他形式的爱。而唯一倾向于排他性的，是情色之爱。这正是支配主义试图把“爱”的概念全部引导到这一形式上的原因。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情色之爱——因为我们通常称为“爱”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而是被简化为单纯的性行为。

(145) 真正的情色之爱意味着专一，因为它涉及的是灵魂的结合，而不仅仅是身体。当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灵魂的连接——而这只有在兄弟之爱作为基础时才可能实现——他们才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许多伴侣无法维持婚姻，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这一层次。爱，是人类在世间最重要的学习。

(146) 大男子主义是系统所灌输的观念之一，用来推动性方面的压迫以及整体的支配机制。男性从小就被训练去压制女性，把嘲笑女性当作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

(147) 控制者鼓励男性以不尊重的方式对待女性，从而在各个层面上支配她们。在巴西，男人在街头对女性大声喊出下流或带有性暗示的话很常见——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一群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学会了用犀利的话回击，把羞辱原样还回去，从而扭转权力关系。

(148) 与此同时，社会的“说话方式”——也就是集体语言——往往带有反女性的倾向。比如在巴西描述伴侣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时，如果是男性占主导，人们会说“主导的男性”。

(149) “主导”这个形容词本身含义广泛，可以用来描述任何具有力量或突出特征的事物，比如：“这个元素具有主导性”。它带有一种中性的意味，暗示一种自然且合理的突出地位，也可以意味着根据情况不同而轮流承担主导角色。

(150) 但当主导地位落在女性身上时，在巴西更常用的说法却是“支配型女人”（即“具有支配性的女人”，也就是“dominadora”）。这里用“女人”，而不是与“男性”对应的“女性”，是在暗示她是一种例外，甚至是不自然的存在。而“支配型”这个词本身带有压迫、失控甚至偏执的意味，就像是在与神争夺权力。当一个人试图篡夺不属于自己的权力时，就容易走向极端，性格变得强硬，甚至让人难以相处。

(151) 在人类之中，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真正合法的“主宰”（大写）——因为他存在于我们之中，并直接与上帝相连。其他人只能通过社会约定成为“被认可的主导者”。有时我也会用“主宰”这个词来指那些篡夺权力的人，以强调支配并不是一种抽象力量。但“支配主义者”这个词更为准确。

(152) 虽然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但它却很容易被剥夺。而最有能力完全剥夺它的——上帝和耶稣基督——反而最不愿这样做。如果他们允许其他灵体干预我们的自由意志（也就是支配主义），那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么同意了，要么是自身行为的

结果。但最重要的是，耶稣才是真正的至高主导。他通过爱与吸引力引导我们，当我们被他的智慧引导时，我们才真正认识自己。

(153) 因此，用一种不带性别歧视的方式来描述伴侣中一方的合理主导地位，可以说“主导的男人”或“主导的女人”。事实上，双方都可以在不同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然而，系统却用“主导雄性”这种说法来去人化个体，这种表达突出并崇拜男性的生理特征，这正是大男子主义的基础。

(154) 在各种支配主义运动中，这里最常提到的是大男子主义。但我并不是出于个人执念而专注于此，也不是在变相宣扬某种形式的女权主义。我认识自己的生父、祖父、曾祖父，也有叔叔、表亲、兄弟、侄子、儿子以及许多男性朋友。因此我清楚，男性同样需要关怀和支持，而这并不是某些女权主义所能提供的。女权主义本身也可能变成一种支配主义意识形态。目前，两性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些性别意识形态造成的。

(155) 不过，大男子主义是最广泛的一种支配主义形式，因此为分析意识形态的扭曲提供了大量材料。而且，由于支配主义的手段在不同意识形态中不断重复，通过大男子主义更容易观察到这些模式。但本书反对的是一切形式的支配主义。

(156) 我的目标，是推动“新约”这一社会理念，以对抗支配主义。它象征着一种精神上的救赎，同时也是心理上的疗愈——通过一位新的“母亲”，使我们在以基督价值为导向的社会中成为耶稣的兄弟。这些价值本质上也是人类的价值。“新约”旨在消除支配主义，重视女性，与“新世界秩序”（NWO）形成直接对立。前者倡导基于真实与自由的人类体系，而后者则建立在谎言与奴役之上。

(157) 支配主义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常常把“权力”和“支配”混为一谈。但真正的权力——更准确地说，是被合法化的权力——始终受到责任的严格限制，而支配主义恰恰试图逃避这种责任。行政中的责任机制，本应防止支配主义的产生。任何管理公共资源的人，如果哪怕有一点点不当使用，都应被视为犯罪。在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法律体系中，这甚至应被认定为加重情节。但在现实中，法律几乎只被用来约束普通民众。

(158) 围绕5月13日的事件——巴西废除奴隶制的纪念日——清楚地体现了权力与支配之间的区别，也揭示了支配主义如何以隐蔽的方式运作。这个日子在几年前不再被列为国家假日。然而，拒绝纪念它，本身同时也是一种奴役行为、反女性行为以及种族歧视。

(159) 在地球上，每一顶真正合法的王冠，都是一顶荆棘之冠。皇帝佩德罗二世在推动废除奴隶制时，深切感受到这份重担——当时他必须对抗巴西的精英阶层。他采取低调的方式，在幕后推动这一进程。而今天，他作为解放者的作用，并没有得到与其贡献相称的重视。

(160) 他不知疲倦地努力，使整个社会逐步走向废除奴隶制，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加以影响。他是一位智慧的人，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为“宽宏者”。他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巴西，并坚定地致力于废奴事业。

(161) 他的人生经历使他对这一事业产生深刻认同。作为君主，他是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却以一种近似“奴役”的方式服务于国家。五岁时，在父亲退位后，他几乎成为

孤儿，因为母亲在他一岁时就已去世。当被立为摄政王时，他失去了自由，被迫每天从早上六点学习到晚上十点，只有两小时的休息时间。

(162) 佩德罗二世身高两米，金发蓝眼——但他却坚定反对奴隶制。他厌恶奴隶的痛苦，并对他们深感同情。他从不拥有奴隶，由一位黑人仆人抚养长大，甚至曾把自己形容为“被奴役的人”。

(163) 他发展了帝国的通信系统，使废奴主义者能够发声，以对抗那些反对废奴的强大精英阶层——这些人多为帝国主义的后代。1850年，他甚至威胁说，如果总议会拒绝禁止奴隶贸易，他将退位。

(164) 他与女儿伊莎贝尔公主关系密切，而她常常完成他无法亲自完成的事情。她公开支持废奴，甚至大胆地在公众场合佩戴山茶花——这是激进废奴主义的象征。她还组织了著名的“花之战”，乘坐装饰着鲜花的敞篷马车在街道上巡游，为废奴事业募集资金。

(165) 因此，正式签署废除奴隶制法律——“黄金法”的，是伊莎贝尔公主。但这一举动却直接导致了共和国的成立，以及佩德罗二世及其家人的流放。无论农业大臣、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如何行动，支配主义者都清楚：真正推动废奴的是佩德罗二世和伊莎贝尔公主。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精英行为，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尽管如此，佩德罗二世选择了和平退位，并拒绝接受任何流放补偿。

(166) 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他仍然遭到诋毁。支配主义者指责他反对毛阿男爵¹⁵⁰，从而阻碍了巴西的发展。但事实上，正是佩德罗二世授予毛阿贵族头衔，并动用国家力量支持他的项目——这清楚表明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167) 还有人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抹黑他的名声，声称他像父亲或导师一样，是共济会成员。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捍卫信仰自由——包括共济会的自由。他平时穿着朴素。有一次，一位外国水手问为什么皇帝没有护卫，有人回答：“整个帝国都在保护他。”在巴拉圭战争中，他更是亲自参战，成为第一位“祖国志愿者”¹⁵¹。

¹⁵⁰ 伊里内乌·埃万杰利斯塔·德·索萨 (1813–1889) ——巴西商人、船东、工业家和银行家。他一生获得多个贵族头衔，先后被封为男爵 (1854年) 和毛阿子爵 (1874年)，以表彰他在帝国时期 (1822–1889) 对巴西工业化的贡献。他是巴西经济多个领域的先驱，其主要成就包括：建立全国第一家铸铁厂和造船厂；修建巴西第一条铁路（位于马热的毛阿铁路）；推动亚马逊河及其支流以及南里奥格兰德州瓜伊巴河及其支流的蒸汽航运发展；在里约热内卢引入煤气路灯；创建第三个巴西银行（第一个成立于1808年，于1829年解散）；以及铺设连接南美与欧洲的海底电报电缆。来源：维基百科。

¹⁵¹ “祖国志愿军” (Voluntários da Pátria) 这一称号由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于1865年1月7日通过第3371号法令设立，号召民众志愿参加巴拉圭战争。来源：维基百科。

(168) 由于他精通多种语言（超过十种），他与当时许多杰出人物建立了联系，并赢得了他们的真诚赞誉。通过这些联系，他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带入巴西。不仅如此，他还推动了国家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巨大进步——因为真正持久的解放，必然包含这些方面。

(169) 然而，在一个严重的错误中，一些黑人意识运动推动用11月20日（帕尔马雷斯的祖姆比被杀之日）取代5月13日（废除奴隶制的纪念日）。祖姆比确实为自身自由而斗争，但并不一定是反对奴隶制本身。多项学术与历史资料表明，他在帕尔马雷斯的基隆博中也实行过奴役制度——尽管其残酷程度低于欧洲的形式¹⁵²。当当局取消对5月13日的纪念时，他们实际上实施了一种形式的种族歧视——这一次针对的是“白人”。而黑人意识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被利用，成为推进支配主义利益的协同力量。

(170) 我们来分析一下：结束奴隶制的运动，难道只是由黑人组成的吗？不是。巴西是一个混合民族的国家。当时许多“白人”巴西人同样坚决反对奴隶制。再问一个问题：废奴只是为了“黑人”吗？也不是。对黑人的奴役只是被羞耻地视为奴隶制的最终形式——这也是为什么由一位女性签署废奴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同时也是对女性被奴役的反抗。

(171) 5月13日属于所有人——“黑人”和“白人”、富人和穷人、男性和女性——因为任何人都可能被奴役。因此，这一天应当被所有人共同纪念和重视。正如我在这里所指出的，“白人”和“黑人”之间所谓的差别，在人类层面上根本不存在。那只是皮肤的颜色，而不是人的本质。这也是我给这些词加上引号的原因。

(172) 控制者希望人们忘记废奴的重要性——因为一旦人们记住，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本应是自由的。而这会让他们更难被困在隐蔽的操控之中。如果佩德罗二世和伊莎贝尔公主的行为变得不被看见，那是因为支配的行为更加隐蔽。

(173) 资本主义是一种支配主义意识形态，它同样以隐蔽的方式运作——表面上看似自由的力量，实际上却被用作压迫的工具。它操纵了“竞争”、“更好”和“更差”等概念，并被虚荣心所污染。撒旦可以被看作这种思维方式的社会投射——一个由人类创造并加以崇拜的虚假之神。当然，在脱离这种压迫环境时，这些概念本身对我们仍然具有意义。

(174) 当我们在某方面“更好”时，如果考虑到所有因素，就会发现我们并不真正优于他人——只是更为幸运而已。但当我们执着于“更好”的骄傲观念时，就为虚荣留下了空间，而这会削弱我们的理性。

(175) 看看这句话有多么有缺陷且具有破坏性：“我想在一切方面都比你和所有人更好。”这几乎等同于说：“我想成为你和所有人，而不是我自己。”这正体现了一种破坏性的竞争。当一个人与他人的优点竞争时，就会迷失自我，对自己和他人形成负面的看法。这种思维既低层次又具有伤害性，使人远离真实的生活。

¹⁵² 参见：https://www.infoescola.com/historia-do-brasil/escravidao-nos-quilombos/#google_vignette

(176) 一个人真正能够“优于”他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自己。当一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成长上，这才是建设性的。心理上也会因此变得充实，仿佛存在的渴望终于得到满足。

(177)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这些词语也被赋予了负面的含义，比如：“无论你多优秀，总会有人比你更优秀。”这句话带有沉重的意味，仿佛无尽的竞争是必要的。在更平衡的使用中，可以说：“我在这方面比你更好”，但不应说：“我比你更好”。

(178) 我特别强调“更好”这个词，因为它的使用需要非常谨慎——它就像人类理性道路上的一个岔点。我们不能将其从认知中剔除，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何时已经尽力，何时达到了自身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

(179) 同时，由于我们本质上会成为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我们应该努力变得更好……更好……再更好¹⁵³。这才是对自尊和自信的正确而建设性的态度。

(180) “更差”这个词也是如此——对它的错误理解同样会导致心理冲突和情感痛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被贴上“最糟糕”的标签，从而被视为无解；或者被完全忽视，因为“总有更糟的事情存在”。但就像“更好”一样，“更差”的概念在自我评估中同样是有用的，例如：“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如别人”。

(181) 支配主义渗透到系统的各个层面，让人产生一种“控制无处不在”的错觉。这个“控制无处不在”的观点源自米歇尔·福柯。不过，我认为这种看法实际上有利于支配本身。我更倾向于认为，控制并不无处不在，而是存在于那些在心理上接近控制者的人之中。

(182) 能够束缚一个人的最微小却最强大的锁链，其实是他自己的观念。一个在身体上被奴役的人，仍然可能尝试逃脱；但一个在思想上被奴役的人，则更难解脱。不过，如果控制不在被支配者的思想中，那它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许多鸟类生活在完全没有控制的状态下——人类同样也可以做到。

(183) 我的祖父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某种程度上享有成长的自由，突破了体制的限制。他是一位农民，拥有一块自给自足的中等规模土地。他每月在商店的小额消费更多是为了便利，而不是生存所需。他通过水车自行发电，很多交易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但他依然并不缺乏资本。

(184) 这个体系试图阻止人们意识到，除了它所提供的方式之外，人还有其他生存选择。支配主义通过“在盲人之国，独眼者为王”这句话来实现控制——它让人们变得“盲目”。它的言论正是使人失明的工具。因此，统治者有时也会制定公正的法律——这是社会努力的成果，因为这样可以让人民与国家形成一致。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计划违背这

¹⁵³ 在“席尔瓦心灵控制法”（1945）中，有一句常用语：“每天，在各个方面，我都在变得越来越好。”这句话强调通过积极暗示实现自我提升，是该方法的重要内容。

些法律，并鼓励他人也这样做。于是，一张建立在支配观念之上的篡夺之网，从宏观到微观被编织出来。

(185) 支配主义会造成人的心理和社会性死亡，甚至导致身体上的死亡。社会性的死亡来自排斥和诽谤；心理和精神上的死亡，则表现为眼中失去光芒、生活没有目标和快乐。在这种状态下，人就像行尸走肉，没有生存动力，只是在消磨时间。而从这种空虚中，疾病产生，最终走向身体的死亡。

(186) 人体的寿命大致是可预期的——最终会因疾病而衰败并死亡。但本书关于通过神经语言学理解疾病与疗愈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大多数疾病和过早死亡，源于心理健康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来自对自身真实身份的错误认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语言构建的一种“心理钥匙”，可以逆转疾病。

(187) 在这一分析中，最具挑战性的疾病是反社会人格（精神病态）——即缺乏同理心、被对他人具有破坏性的冲动驱动的人。相关理论往往为这种状态增加了层层神秘色彩。

(188) 然而我们也观察到——就像其他精神疾病一样，有些人是天生失常的，而有些则是在后天形成的。很多时候，疯狂源于被压迫者羞辱后产生的杀意。我提出一个假设：希特勒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之一——出于对过去某种伤害的报复而转向仇恨犹太人。

(189) 还有一种情况，在文学中被描述，并在无意识中被军方所鼓励：通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制造出精神病态者——即顺从受害者的刻板形象¹⁵⁴。

(190) 一个支配主义者可能会沉溺于支配带来的快感，以至于希望被支配者满足其一切细小的欲望。但事实是：被迫行动的人是奴隶，而为了操控他人而强迫自己不行动的人，同样也是奴隶。如果一个人坚持这种思维方式，就会对他人所能给予的一切始终感到不满，最终甚至可能发展成一种心理上的“残缺”。

(191) 支配主义是一种人类心灵的疾病，是一种使人退化为动物状态的过程。它诱导我们走向轻松的道路——那条“宽门”。但如果我们跟随它，就会退步。它把我们困在低层次的欲望之中，比如复仇的欲望。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法则，曾经是一种限制——用来防止复仇无限扩大。但这一原则早在数千年前就已被基督教所超越。然而，即便如此，仍有无数人连这些基本的界限都忽视。

(192) 总体来说，上帝并不赞成报复——祂教导我们始终要宽恕。祂并不反对的是补偿，只要其中不包含恶。因此，祂曾指示希伯来人在离开埃及时向埃及人索取财物¹⁵⁵。如果我们行恶，即使是以“以恶还恶”为名，我们也会被卷入其中，最终反噬自身。简

¹⁵⁴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指一种心理状态，即人在长期受到威胁或控制后，反而对施害者产生同情、好感甚至依附关系。来源：维基百科。参见：pt.wikipedia.org/wiki/S%C3%ADndrome_de_Estocolmo。

¹⁵⁵ 圣经，出埃及记11:2-3。

单来说：种恶得恶，种善得善。对于相信造物主的人来说，我们只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有责任行善。对于从内在之神出发的人来说，结果也是一样——良心不会容忍自身的恶，并会对其产生反作用。

(193) 上帝之所以允许补偿，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去争取应得之物，就无法真正与伤害过我们的人和解。怨恨会残留，信任也会消失。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克制自己不去作恶，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会有补偿。因此，补偿虽然可能带来痛苦，却有助于恢复彼此之间的理解。但它不同于报复：补偿是为所受之害得到善的回馈，而报复则是以伤害回击伤害。

(194) 然而，当我们拒绝承认自己的过错时，上帝也会允许报应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祂会对我们展开审视¹⁵⁶，而我们曾伤害的人可能被允许向我们“讨回”。从“内在之神”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我们在无意识中变得疏忽，从而引来报应者。一些更为成熟的人，既不渴望报复，也不寻求补偿。但要过完整的人生，至少应远离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上帝希望使我们彼此靠近，而祂将补偿视为平衡关系的一种方式——当双方都得到满足后，和解才有可能发生。

(195) 不过，当对方既无法补偿，也无法对我们造成报复，而我们又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时，我们依然会按比例承担后果。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反射”的世界里。我们释放的负面能量，会以同样的强度反弹回来，就像撞上盾牌后反射回来一样。对于相信造物主的人来说，祂会精确地让我们偿还“债务”。例如，当我们受到惩罚时，只有我们应得的部分才会真正让我们感到痛苦。而那些我们曾想施加给他人的伤害，即便未能实现，我们也同样要为之付出代价。

(196) 在灵性层面上，如果我们明知某件事是恶，却仍然认可它，我们就等于“失去”了那只手——即使在身体上它依然存在。我们的手投射恶，因此也会承受恶。生命本身有其逻辑，所谓“地狱”也有其逻辑。即使我们在现实中没有失去任何肢体，也可能在灵性层面一无所有。有时，一个人在现实中失去一条腿，人们会说那是因为他的腿把他带向了邪恶；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灵性世界中反而可能“拥有”那条腿，因为其负面作用已经被清除¹⁵⁷。

(197) 《圣经》讲述的是上帝试图使人类摆脱奴役的历史——因为我们的奴役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邪恶的政府可能会强化这种状态，但问题不在于“政府”本身，而在于邪恶。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17节中曾被间接问及这一点：“请告诉我们，你怎么看？向凯撒纳税合法吗？”

(198) 这个问题本身带有恶意，因为无论祂如何回答，都可能被指控为政治罪，而非宗教问题——从而引发对祂的攻击。提问者似乎想借此激怒一方或另一方：若不触怒统治者，就会激怒犹太人。但耶稣的回答没有冒犯任何人，因为祂并不反对政府本身，而是支持人的转变。

¹⁵⁶ 圣经，耶利米书2:35——“你还说：我是无辜的，他的怒气必已离开我。看哪！我要审判你，因为你曾说：我没有犯罪！”

¹⁵⁷ 圣经，马太福音5:30——“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

(199) 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中，耶稣回答说：“该归凯撒的归给凯撒，该归上帝的归给上帝。”祂的意思是，祂并不反对治理，而是反对不诚实。祂强调，我们献给上帝的不是金钱，而是精神层面的价值。

(200) 甚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原因，也与意识形态的支配有关。毕竟，尽管耶稣是大卫的后裔、犹太人的王位继承者，但祂并不构成现实威胁，因为祂是众所周知的和平主义者。然而祂仍因政治原因被处死。如果是宗教原因，本应采用石刑。甚至门徒们也未能理解耶稣并无政治野心——即使他们亲眼见证了祂的诸多作为¹⁵⁸。因此他们彼此争论，仿佛政治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201) 耶稣提升了祂所医治之人的意识，因为祂最深层的关注在于恢复人的本真身份。真正的个人解放，是不被暴政的幻象所迷惑——因为那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会让人因自身错误而被奴役。

(202) 支配主义与暴政直接相关。它是一种原始的人类行为，使人被曾经服务过的人所贬低和奴役。但我认为，不愿服务的人反而是不幸福的——因为当我们出于自由意志去服务时，我们同时既是仆人，也是“王者”，正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203) 我们已经发展到足以改善这个体系的阶段。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去结束这一被支配主义所毒害的、落后的精神阶段。

(204) 任何宗教，即便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必须不断追求成长——因为这才是接近上帝的道路。如果将“反基督”理解为一群信奉反基督思想的人所构成的网络，那么我们就必须警惕，不要让自己成为这个网络的一部分——确保自己不会误入错误的精神共同体。

(205) 反基督的观念具有破坏性——因为它们把原本属于核心价值的能量扭曲到相反的方向。缺乏基督价值观会带来巨大的破坏。但只要有一个真正思考、向善的人，就足以引发连锁反应——就像一间房间，只需一盏灯便能被照亮。

(206) 我们已经发展到足以改善这个体系的阶段。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去结束这一被支配主义所毒害的、落后的精神阶段。



¹⁵⁸ 圣经，马太福音20:21。

图像 III

1917年伦敦一处充电站停放的电动车。¹⁵⁹



卡门·米兰达——2011年3月美国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上面是这位歌手的形象。她在1970年代之前就已成为巴西的文化象征，并在那个时期广受欢迎。邮票突出了巴西的水果。



若泽·卡里奥卡——由美国公司迪士尼创造的角色，用来代表巴西人。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在70年代走红。形象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虽然贫穷，但生活轻松、享受闲暇。

¹⁵⁹

参见：
https://ar.wikipedia.org/wiki/%D8%AA%D8%A7%D8%B1%D9%8A%D8%AE_%D8%A7%D9%84%D9%85%D8%B1%D9%83%D8%A8%D8%A9_%D8%A7%D9%84%D9%83%D9%87%D8%B1%D8%A8%D8%A7%D8%A6%D9%8A%D8%A9 参见：<https://www.coulst.com/blog/evchargersareold>